

制造文化记忆： 一座简牍博物馆的中介化实践

张丽华 陈星月

摘要：在古代中国，简牍是传播媒介，并不是时人需要刻意保存以流传后世之物，在传承过程中存在断裂。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是思想的物质存在条件。正是因为“馆”的中介，“简述中国”这一观念才得以成为今人需要习得的文化记忆。这在实践中涉及三个层面：博物馆使记忆的主体从专家扩大为社会公众；片段式的、无定形的、不成关联的简牍，通过博物馆再语境化，与现代国家命运相关的文物进入公众视野，成为文化记忆的对象；简牍博物馆介入公共教育系统、大众媒体等，将公众的“观看”方向引向简牍所代表的中国历史文化，让文化记忆在更大的社会空间中扩散。

关键词：简牍；博物馆；传承；中介；文化记忆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26)01-0087-09

基金项目：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委托项目(2025ZDWT0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23XXW009)

一、引言

2023年9月7日，甘肃简牍博物馆正式开馆。馆内“简牍时代”展厅的第四单元“甘肃简牍百年大事记”下方有这样的解说词：“西北地区地处祖国边疆，是秦皇汉武建立过文治武功的地方，又是丝绸之路和中西交通的重要通道。一个世纪以来在甘肃、新疆发现的大量汉代简牍真实而生动地记载了这一历史的全貌，是研究西北史、秦汉史以及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资料，并深刻地影响了一个世纪以来的学术研究。”这段话有助于我们理解博物馆是一个国家和社会体制化的记忆机构。参观者被纳入现代国家的站位中：从时间上看，以当下回看历史——“秦皇汉武建立过文治武功的地方”；从空间上看，为我们划定了一个固定的国家疆域——“西北地区地处祖国边疆”；从意识形态上看，简牍作为出土文物，是认识或了解中国的“新窗口”——“研究西北史、秦汉史以及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资料”。事实上，简牍博物馆近年来正是以“简述中国”为主题，传承、传播负载于简牍之上的中国历史文化。

如果我们将“简述中国”当作今人需要习得的文化记忆，那么，简牍何以代表中国？这样的记忆是如何形成的？这需要绕到观念的背后，关注思想的物质存在条件。“当想法成为主义或信仰，其耀眼的光晕让人忽视这些历史过程，但即便如此，所谓超越物质或肉身的精神，只有透过文化物件才能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其传世的踪迹。”^[1]具体的简牍何以和抽象实体“中国”产生关联并成为人们需要流传下去的共识？毕竟古人是不存在现代国家这种意识形态的，而且简牍在传承过程中存在1000多年的断裂。就本研究而言，这里的文化物件即“博物馆”这一媒介，正是通过它的运作，简牍实现了意义的转换，从古人的日用之物，变成“中国”这一意象或信念的“化身”，简牍的所指是中国——这成了公众文化记忆的对象。

二、文献综述

(一) 媒介学视野中的传播与传承

在媒介学者看来“传播”和“传承”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传播是在空间中传递信息,也就是说在同一个时空范围内进行。传承指的是在时间中传递信息,确切地说,是在不同时空范围内进行的。”^{[2]5} 传播是一定时间内的信息流通,是长期过程的瞬间,而传承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历时性的,侧重代与代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传承这一概念落在了记忆的维度上,它包括所有表现集体记忆的词语。^{[2]5} 不过在德布雷的著作中,他对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并没有进行严格区分。

任何思想精神欲以传播或传承,都需要物质化的载体。莎草纸书、碑刻、青铜器、简牍等,这被德布雷称为物质材料或组织材料。这些物质材料在特征上有些偏向于时间,有些偏向于空间。具有空间偏向的物质材料在它们所处的时代,是重要的传播技术。不过这些物质材料未必能经受时间的侵蚀或者人为的破坏。因此才有遗产保护领导机构、研究室、艺术品收藏馆、历史建筑修复监督机构等^{[2]18},毫无疑问,博物馆也是其中之一。这些机构被德布雷称为物质化的组织。可见,“传承”涉及两个层面:彼时的物质材料和此时的物质化组织。物质化的组织是物质材料的“载体”,如果没有前者,后者在时间的长河中很难延续下去,“依照两者的共同作用,一种观念才得以在历史中扩散、流转、传承”^[3]。

传承并不是物质化的组织对物质材料的简单保存,这些机构组织发挥着“媒介”的作用。所谓“媒介”即中介,是“使两者发生关系的第三者,如果没有这个作为第三者的中介,这种关系就不会存在”^{[2]122},媒介的中介行为“同它是一个操作设备是分不开的。媒介分析就是授予交流载体一定的职能,使其从属于其功能,比如……博物馆与展览的关系”^{[2]10},这里的“中介行为”指的是一个调解的动态过程,而“操作设备”,则表示载体是如何在中介行为中发挥功能的^[4]。例如博物馆的功能是展览,那么它作为媒介是如何发挥这样的功能的? 毕竟,物质材料放在16、17世纪的“奇珍室”和放在现代博物馆里是不一样的。

那么传承媒介究竟中介了什么呢? 德布雷给出了一个具体的方向,即某种观念是如何经由物质载体生成的。“某种‘主义’或观念要成为一个实体,就必须有组织化的载体,否则无法扩散,更无法实现在时间中的传递。”^[5] “‘宏大观念’因传承技术而具有了立法的力量,‘中介化’不仅是一种传承,而且还是一种制造。”^[6] 换句话说,传承本身就是为思想、文化等任何精神观念层面的事物赋权的过程,使其具有合法性并且能够在时间中延续。

不过,媒介学提供的仅是一个看待博物馆的视角,要分析作为传承媒介的简牍博物馆是如何使人们产生某种观念的,还需要一个更具有操作性的概念。

(二) 文化记忆

文化记忆是社会的长时记忆,与传承有关。它是被社会成员所共享的,以客观化的固定形式存在下来的,一个社会在一定的时间内必不可少且反复使用的文本、图画、仪式等内容,基于它,该集体的成员们意识到他们共同的属性与与众不同之处。^{[7]41-54} 文化记忆具备以下特征:第一,其载体主要是专职成员或机构,如游吟诗人、祭司、先贤祠、博物馆等。文化记忆不会自动地进行下去,它是一个“集体不可遗传的记忆”^{[8]11},只有交由专门的成员或机构,在传承的过程中,关于过去的知识才不至于偏离其所属群体共同认可的价值体系,才能以稳固持久的方式得以流传。第二,集体成员的共同参与。文化记忆不是个体记忆的简单相加,而是作为人类记忆的外在维度,通过仪式、文字、教育等形式进行传播,群体成员需要将记忆内容内化,以保证文化意义上认同的再生产。例如在无文字的史前时代,仪式和节日是广大民众都可以参与的文化记忆形式,而放置在坟墓里的文献或者祭司为死者念诵的经文则不属于文化记忆范畴。

文化记忆和集体记忆也是有区别的。在哈布瓦赫那里,集体记忆就是一个群体内所有成员共享的、有关过去的表述。是属于同一个集体的成员分享共同的记忆。^{[9]335} 也就是说,集体记忆就是个体

记忆的总和。阿斯曼将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划分为“交往记忆”,其载体是过去亲历者,记忆的存续手段是成员间的口头交流,因此,交流记忆在代际间就会发生消解,它只能维持三四代人。而文化记忆是通过被创建的、高度成型的、庆典仪式型的社会交往形式,以文字、图像、舞蹈等媒介进行编码和展演,时间跨度长。^{[7]51} 在分析有关现象时,要警惕将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未加辨析地混用。例如有学者探讨公众对黄道婆人物记忆的建构及变迁,时间跨度从元代到当下,记忆载体涉及历史叙事、民间传说、纪念仪式等,明显符合文化记忆的视野,作者却使用了集体记忆作为分析概念^[10]。

目前,关于文化记忆的研究侧重于以下方面:某一空间作为文化记忆的场地,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作用^[11],新时代文化记忆所发挥的新功能^[12],电影、戏剧、短视频等对文化记忆的建构^[13]。这些研究对本文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忽视了承载记忆的载体所发挥的作用。不可否认通过博物馆等文化载体,一个民族一种文化才能将传统代代延续下来^[14],但这和经过仪式所保留的文化记忆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在文化记忆研究者的视野中,载体媒介的特性还没有释放,甚至关注载体有可能陷入一种纯粹的媒介决定论^{[7]17},因此博物馆在文化记忆研究者那里“通常被视为一个建筑空间,只是一个提供媒介技术的场所”^[15],关注记忆背后的物质力量是本文的出发点。

三、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不是借简牍“追古”:既不是历史学、文献学侧重的负载于简牍之上的书写意义或所折射的制度、文化、农事;也不是媒介环境学意义上的简牍在其所处时代所引发的制度、思想层面的变革。本研究秉持着将思想生产从文本内容中解放出来的思路,以一座地方简牍博物馆为例,通过媒介学的视角或方法,研究如下问题:简牍博物馆是通过何种中介化实践制造文化记忆的。这涉及彼时的物质材料和此时的物质化组织两个层面:第一,我们将从简牍的特性出发,结合中国思想史,讨论其作为传播媒介无法形成文化记忆的原因;第二,我们要探究的是“简述中国”这一文化记忆背后的物质力量,即作为物质化组织的博物馆是如何使文化记忆发生的。

本研究主要采用实地考察和访谈等方式进行资料收集。笔者之一曾于2024年5月—12月间数次前往甘肃简牍博物馆进行实地调研并对31位游客进行了现场简短访谈,其中男性11位,女性20位,受访者编码由性别和序号构成。访谈问题包括“为什么会来简牍博物馆”“之前对简牍有哪些了解”“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个展厅/展品”“参观完简牍博物馆有哪些感受”等。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中的访谈并不是为了探究被访者对于行动、事件或物件所赋予的意义^[16],而是为了了解或探究博物馆是如何将人们的认知或行为引向了简牍所代表的文化思想的,即“观察机器对人的影响……发明对发明人的作用。”^{[17]88}

四、书于竹帛:作为传播媒介的简牍

任何思想欲以外化,必须借助一定的物质材料,不过物质材料的性质会影响到思想的流传。《墨子》中有一段话:“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咸恐其腐蠹绝灭,后世子孙不得而记,故琢之槃盂,镂之金石以重之。”^{[18]237-238} 书写在竹帛上的事迹会面临王朝更迭的销毁或自然腐蚀,后世子孙无从记忆;雕琢镂刻在器皿、石头上才能保存、延续祖先的荣光。“书于竹帛,镂于金石”,在中国思想史中,“石头的所有自然属性——坚硬、朴素,尤其是坚实耐久——使其与‘永恒’的概念相连;木头则因其脆弱易损的性质而与‘暂时’的概念相关”^{[19]210}“古代文字之刻于甲骨、金石,印于陶器者,皆不能称之为书”^{[20]180}。

战国至魏晋时期,简牍是主要的书写材质,用于空间上的横向交流,是人与人之间往来的媒介^{[20]157}。有学者对简牍之上的内容做了详细统计:“帝王诏令、政府文告、军报檄书、法律条款、司法案卷、经济契约、账册簿记、医药处方、名籍档案、通行凭证、考核记录、奖惩通知、财物清单、军械登记、日书历表、私人书信等。”^[21]可以说简牍是当时社会的大众化媒介,其应用之广泛,使用人群跨越了不同的圈层。在汉代,为对边境地区强化中央集权,帝国使用了统一化的简策进行文书行政和宣

扬儒家思想,这种治理方式也被周边国家所吸收。例如朝鲜平壤贞柏洞364号墓出土的户口簿、连云港尹湾汉简“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安徽天长出土的纪庄汉墓“户口簿”,它们不仅在形制规格上一致,而且在记载方式上,也使用了统一的简牍文书样式。再如西汉宣帝、元帝时期,具有统一样式的《论语》就在东亚社会中传散开来。这一时期,《论语》虽不属于五经,实质上被视为经。不过,汉人所述经典简册长度通常为2尺4寸,但为了便于携带,《论语》被书于8寸长的简牍之上,以便在民间社会普及儒家理念。平壤贞柏洞出土的乐浪《论语》竹简与定州汉墓《论语》竹简在形制上相似,极有可能是从汉代内地流入的,《敦煌悬泉置汉简》中出现的《论语》卷一九《子张》篇的残片,都可以看作当时全国普及《论语》的一部分。以经典“移风易俗”的统治实践,还促进了汉字的传播,其后果之一是东亚社会“汉字文化圈的形成”^[22]。

当简牍被纸张代替,其在时人的日常生活中逐渐销声匿迹,或者说在现代之前,并没有专门的物质化组织将其保存、传承。西汉、东汉、西晋、南北朝、唐、北宋时代均有简牍发现,比较著名的两次是:汉武帝时期,鲁恭王在孔子旧宅获得的“孔壁中经”,以及《晋书·束皙传》记载的西晋武帝时期汲县战国晚期魏墓里出土的“汲冢竹书”。不过这些实物并没有流传下来。当今的考古发现亦可证明,古人并没有刻意保留简牍以传承后世的愿望。简牍的出土地有两类:墓葬和遗址。墓葬之物是来世之用,遗址之物有些属于当时正在使用的文件,有些则出于垃圾堆,是废弃不用的文件^{[23]78}。

在古代,简牍为何没有以官方藏书的形式保存下来?除了其本身易腐的物理属性外,还和中国古代的文化环境有关。中国古代的学术传统注重文献考证、注释、辨析文字所传达的思想或内容,对文字依托的书写材料和书写工具不关心,“学者对器物注意最多的是金文,其他,很多是靠墨本和铃本。”^{[23]43} 这从王国维的话中也能得到侧面的证实:“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学家之学……晋时汲冢竹简出土后,同时杜元凯注《左传》,稍后郭璞注《山海经》,已用其说。”^{[24]33}

20世纪初,简牍重新出现在公共话语空间中。斯文·赫定、斯坦因将西北出土的简牍带往英国后,知识分子发出了“神物去国,恻焉疚怀”的感慨。简牍何以从古人的日用之物变为了今人的“神物”?这与西方殖民主义的背景有关。其一,吾土之物,离开吾国。“去国”的“国”,不难让人联想到当时已经出现的现代国家观念。其二,考古学学科观念的传播。中国金石学家关注的是商业价值和艺术价值,但在考古学的视野中,只要是发掘品,都有一定价值。^{[23]43} 至此,简牍不但是一个学术或专家技术操作层面上的概念,更是作为一种集体象征或国家赖以呈现的文化资本,开启政治和文化的意义,指向更高级、更形而上的层面。

五、“简述中国”:经由博物馆中介的文化记忆

文化记忆的前提是由于人或事物在过去的中断,当人们在中断后尝试重新续接时,过去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的,过去被赋予新的意义。甘肃简牍博物馆馆藏文物有天水放马滩秦简、居延新简、肩水金关汉简、地湾汉简、敦煌马圈湾汉简、悬泉汉简及魏晋简牍等共计近4万枚,不过,向公众展出的仅有千余枚,这些简牍的展呈构成“简述中国”的主题。“没有传承技术和传承观念的机构就没有观念体系。”^[25] 换句话说,将“简牍”和“中国”相互关联,这一观念要成为后人的文化记忆,则需要博物馆这一传承媒介的运作,将简牍所蕴含的意义普及化、制度化、固定化。下文将从记忆主体的转换、记忆内容的固定化、记忆空间的扩展三个方面加以阐释。

(一)从库房到博物馆:记忆主体转换

甘肃简牍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时,在国家文物局网站上,有这样的表述:“由于缺乏展陈场馆,这些珍贵简牍文物大多只能‘沉睡’在库房里,仅供学术研究……新馆的投入使用,让一批简牍精品得以走出‘深闺’绽放光彩。”^[26] 库房是一个储存式媒介,其组织功能是对简牍进行物理保存以及学术研究,其记忆主体是简牍的研究者,这限制了简牍在社会层面发挥文化价值。严格地说,存在于库房中的简牍还无法成为文化记忆,是属于未被记忆主体居住的储存记忆^{[27]26}。“外部记忆只有通过

一个群体的内部记忆才能产生力量”^{[2]9},要形成文化记忆,则要求集体成员的共同参与,这就需要—个生产集体心理的信息模具。^[28]

博物馆的组织功能在于将先前从公众视野中被隐藏的物品置于开放和公共的语境中,混杂和融合公众(精英和大众)。^{[29]285}换句话说,博物馆中的简牍对于所有人都是开放的、免费的,研究者和普通民众的关系被“馆”这一信息模具所拉平。从库房到博物馆不只是简牍的位移,而是原本用于学术研究之物扩大到社会层面,公众通过观看、交互等实践方式,成为记忆的主体,将简牍纳入自己鲜活的具体化记忆中。

博物馆中的简牍是以物质形态存在的可经验之物,它们虽然被放置在玻璃柜里,但相比书本或影像,公众对简牍的形状、形制有了更具体、直观的认知。F14表示博物馆中的实物,能够呈现更多细节:“电视剧里我感觉它挺厚的呀,结果那展柜里看着就薄薄一小片。我感觉有的又细又小,字也小,我都快看不清了。”此外,简牍博物馆有一个展厅专门介绍了简、牍、觚、楬、策、符等不同形制,甚至制作过程。F13表示参观完博物馆后对简牍有了更全面多样的印象:“东西摆在面前能看见大小啊质感啊厚度啥的……而且不像电视剧里那么单一,我以为会把木头切得很规整,但是有些是弧形的,有些很宽,而且长短也不太一样。”

不过,简牍缺乏视觉吸引力以及语言字体上的辨认难度,使普通公众要理解其上的内容颇有难度。甘肃简牍博物馆除了常规化的讲解以外,还通过VR眼镜、投影动画、电子交互屏等多媒体形式,展示简牍上的故事、历史背景等,通过这些数字技术,公众不但可以理解承载于其上的文本意义,还可以与“过去”产生实时交互体验。例如作为镇馆之宝之一的“张掖都尉荣信”,这是汉代的出入关津凭证。它被放在多媒体展柜中,是一幅绛红色缙帛,而正面的柜屏上是其数字图像,游客可以通过触控查看其尺寸、背景介绍、书体等信息。M7认为和触摸屏交互有一种“触手可及”之感:“这个文物本身保留得特别完好,感觉很规整。而且实物你只能看一个角度,但这个影像可以让人翻来倒去,放大缩小,就像它曾经的主人一样把玩,我在想象它以前是放哪儿的,揣在衣服里还是挂在外面?”

因此,“简述中国”的第一层意思在于博物馆这一物质化的组织本身,就是现代国家的表征——简牍作为人民民主国家藏物,不但要向全体人员开放,还有义务促进参观者对展品的理解。经由博物馆的中介,简牍从静止的、缺乏个人体验的纯粹过去,内化为集体成员的鲜活记忆,具体的个人被询唤为具有集体心理的公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简牍博物馆成为“大众了解中华文化的一个新窗口”^[30],在人们的参观体验中,简牍的生命力在当前的生活世界中得到延续。

(二)对“祖地”的追忆:简牍的再语境化

文化记忆的主要内容是一个社会或一个时代之至关重要的过去,而这个过去是为了建立公众对当下所属集体的认同和归属。简牍属于帝制时期的日用之物,如何将其转变为关于现代国家的文化记忆?如果说简牍属于博物馆这一媒介所承载的信息,那么博物馆的中介化运作在于将信息审查、过滤、强调,将集体分享的知识固化或客观化^[31],以使新的意识形态进入。甘肃简牍博物馆分为“简述丝路”“简牍时代”“边塞人家”“书于简帛”展厅,它们的展呈遵循着现代国家的历史叙事。以“简述丝路”展厅为例,民族国家必备的要素是一块人民所永久居住的土地^{[32]145}。博物馆将出土于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简牍,配合以其他文物、装置、模型等以丝路史地故事为主题再度语境化,为公众讲述了中国西北地区领土历史化的过程,使其认识到身处的西北土地是一块“我们的”先圣先贤、英雄豪杰生活、工作、祈祷和战斗过的“祖地”^{[33]16},中华民族则是“历史化领土的占有者和领土历史化的主体”^{[34]141}。

“简述丝路”展厅由“路在何处”“向西而行”“塞防千里”“东来西往”“丝路见证”五个板块组成。在前三个板块中那些能够证明汉代中央王朝行政力量和军事力量向西北延伸的简牍及文物被赋予了重要地位。例如作为镇馆之宝的居延里程简和悬泉里程简,各被单独放在一个展柜中;52个长短、宽窄不一的木简文物,构成“列四郡”(武威郡、张掖郡、酒泉郡、敦煌郡)的历史;5×3米的展台区、3D场景雕塑和投影,对“悬泉置”这一古代邮驿机构进行了介绍;“西域都护木简”“安远侯木简”“军情

文书木简”“精绝国木简”等4组9个木简,讲述了首任西域都护“郑吉大将军”的故事;“守御器薄木简”“塞上烽火品约木简”、长城烽火台微缩模型、烽火示警电子交互屏、仿制木转射的墙体、一块庞大的实物积薪,则搭建起汉帝国西北边防的场景。几乎所有讲解员都会强调西北简牍是西域国家被纳入汉帝国掌控的原始凭证,游客们在如此这般展呈的引导中,增强了对疆域历史的记忆和认同,M9表示:“经常听说自古以来某某是我们不可分割的领土,我历史不太好,对这个‘古’不太清晰,但这些文物清晰地说明了比如新疆地区,自汉代开始就已经是中国版图的一部分了。”

“东来西往”和“丝路见证”板块则从具体的人和物的层面讲述了西北边地原本多源歧异的人口,被系结在同一块疆域上,被熔铸成为一个“国族”的历史。“东来西往”板块的展呈契合了民族三交的叙事。共有“过长罗侯费用薄木简册”“乌孙公主木简”“冯夫人木简”“西域诸国木简”“龟兹王夫人木简”“康居王使者木简册”6组展柜。讲解员们在这一部分都会提到在悬泉置招待长罗侯常惠一行的故事、康居王使者从敦煌入关后贡献骆驼的故事以及解忧公主及其侍女冯嫫出使西域的故事。“丝路见证”板块展呈的是与汉代边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之物。汉代肩水金关遗址出土“兔子简”,悬泉置出土的大麦、大蒜等实物标本、居延甲渠候官遗址中出土的竹笛,是人和地互动的见证。观展中,游客对于中华民族这一国族历史的想象被唤起,F11表示:“就是像墙上的画儿呀,然后那些雕塑呀、交易啊、往来啊的场景,让我能想象到那个时候人们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场景,丝绸之路上人来人往、骆驼成群的热闹劲儿,各民族就是在这样的交往中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

博物馆通过将出土于不同时期、不同地方的简牍及其他物品转变为展品,文物的展呈被纳入现代国家历史叙事的意义框架中,超越了地方性和区域性,简牍所搭建的西北地域的历史记忆被客观化和固定化,这是“简述中国”的第二层意思。

(三) 简牍热:文化记忆的空间扩散

文化记忆传承的前提是在社会上传播。然而,博物馆毕竟是在地的、无法移动的,如何让“简述中国”这一观念被大众认知?这离不开简牍博物馆“作为意识形态的组织结构,将一种话语所形成的氛围链接出一场轰轰烈烈的事件”^[5]。近年来,在甘肃掀起了一场“简牍热”^[35],典型表现是简牍走出博物馆的硬性封闭边界,走进校园以及简牍知识的影像化传播。这些活动或节目以“‘简’述中国,‘牍’懂丝路”“简传千年,品‘牍’中国”“‘简’述历史,‘牍’懂中华”等命名。作为“事件”的简牍热,是简牍博物馆介入公共教育系统、大众媒体等,将大众的“观看”方向引向简牍所代表的中华文化历史,实现“简述中国”这一文化记忆在空间上的扩散。

学校是一种以集体接收为基础的组织机构。^{[36]300}近几年来,甘肃简牍博物馆和大中小学携手,构建起覆盖多代际的文化遗产模式。早在2021年实体展馆成立之前,甘肃简牍博物馆和兰州大学文学院强基班共同开办了“兰山论简”读简班,为文化记忆的传承培养专门化的人才,学生们“从不辨简牍为何物,到能读懂悬泉汉简的文字,再到对其反映的社会生活提出自己的学术观点”^[37]。如果说读简班更具有学术倾向性,那么简牍博物馆开办在中小学的流动展或“思政课”则更侧重于激发学生们对简牍以及承载于其上的中华文化的兴趣。通过小小讲解员、互动问答、参与体验等方式,学生们已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成为文化记忆的参与者并嵌入简牍文化传承的社会实践中。

大众媒体这种“分享”式的信息传递模式,通过对全体成员传送一样的内容,承载集体的话语和力量,在群体成员中形成一个能够相互联结的视域,促使文化记忆的传播。近年来,简牍博物馆还与主流媒体联合,通过直播、视频的方式将简牍知识创造性地转化为大众文化。2023年10月25日,简牍博物馆联合央视频推出“夜游博物馆”直播活动;2024年5月18日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联合甘肃简牍博物馆推出《“牍”懂丝路》共10集,通过探馆、访谈、演讲、现场互动等方式,讲解简牍所承载的丝路历史。M4是甘肃卫视的节目副总监,他表示简牍所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促使电视台与博物馆的合作:“简牍博物馆自去年以来非常火爆,从参观、研学到学术交流。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是近年影视节目创作的主流方向,不过简牍对普通人来说还是新鲜事物,和简牍博物馆合作,进行简牍文化的宣传推介是甘肃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和转化的新抓手和着力点。”简牍博物馆和关于简

牍的影视节目并不是表现与被表现的关系,而是说没有博物馆对简牍的再语境化——使其代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历史,简牍知识的影视呈现本身则无法发生。

“民族必须拥有一定程度的公共文化和公民的意识形态……确保实现这套共同的公共性大众文化的任务,要交给专门的大众化机构来承担。”^[33]¹⁷“简述中国”的第三层含义在于这种表述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其他大众化机构所引发的社会实践创新。作为媒介的博物馆,如同一个“活生生的力量漩涡”^[38]¹,将学校、大众媒体等机构吸纳进来,使“简述中国”这一文化记忆在社会层面撒播,进入更广泛的时空场域。

六、结论与讨论

中国有句古话“智者以指指月,而愚者看指不看月”,然而在媒介学视野中,真正需要关注的却是“手指”,它横亘在“看”与“月亮”之间,也就是说,手指不但是一个物质,更是由物质所规定的介入和指引,是一个中介。^[39]就文化记忆的形成而言,这个居于中间的手指,可以是仪式和节日、可以是学界的知识分子、可以是某一种数字媒介,还可以是博物馆。不过,不同中介所敞开的领域,带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传统社会,文化记忆的首要组织形式是仪式和节日之间,但是这两者属于日常生活中的“阈限”,节日与节日之间,仪式与仪式之间有间隔。这意味着尽管仪式和节日在传承文化记忆方面有着重要地位,但其间断性使得它们难以实现文化记忆在日常生活中持续渗透,难以让文化记忆时刻活跃于大众的日常感知之中。而目前学界对于出土简牍的研究,往往着力于将其当作“反映”历史的文献,这种研究视角停留于挖掘简牍背后的历史信息,严格意义上讲是局限于研究者群体的记忆,并不是集体所共享的文化记忆。当下流行的短视频、直播、播客等能够跨越空间,使得众多个体意识流共时化,在横向上,能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心理基础^[40],甚至形成“可体验的共同体”^[41]。但相比具身性参与所获得的记忆,这些媒介是对观众记忆的遴选、收缩与剪辑^[42]³⁹。有可能使具有长时特征的文化记忆面临失忆的挑战。不可否认的是,传承的前提是传播,文化记忆需要由群体成员的共同参与,但如何保证文化记忆内容在传承过程中的规范性?这就需要有一个能够超越时间,并面向公众开放的组织化机构。

流沙坠简,由于简牍长期被湮没,对于普通人而言颇为陌生。它是纸张发明之前,中国古代主要的书写材质,作为横向的交流载体,并不是时人需要刻意保存以流传后世之物,即使物质形式被损耗了,附着于其上的文本可以在其他载体上继续被抄写和传播。这也可以解释,作为实物的简牍一度在中国历史上是消失的,但人们对于其记忆却没有中断,人们依然可以从文字记载中发现其存在过的痕迹,如在日常生活中将史书称为“汗青”、将书信称为“尺牍”、将文书称为“案牍”、将书称为“册”“卷”,不过这时候的记忆还没有上升至文化记忆,因为它还无关乎一个群体政治身份的象征。为了重建关于简牍的记忆,需要在文物和公众之间有一个中介或载体。

本研究用“制造文化记忆”意在说明博物馆作为媒介,是制造一个看法或传递一个言论的手段^[36]³⁶³。博物馆就是制造并传递“简述中国”这一观念的中介:首先,简牍从仅供专家学术研究之用的库房,被转移至无门槛的、人人可以进入的博物馆。后者不但将专家和大众的身份拉平,而且使得社会上的公众成了记忆的主体,在人们的参与体验中,关于简牍的文化记忆得以发生。其次,所有以“馆”的形式出现的都是要符合社会标准和正统规范标准的^[2]¹⁹。博物馆通过筛选、排序,使简牍所承载的意义固化或客观化,与现代国家形成历史有关的简牍进入公众视野,成了文化记忆的内容。最后,简牍博物馆介入公共教育系统、大众媒体等,使简牍所承载的关于中国的文化记忆在更大社会空间中传播。经由博物馆这一中介,简牍在公共空间和意识形态空间都拥有合法的身份,“简述中国”这一文化记忆得以成形、扩散、并流传,有可能植入每个社会成员身上,被不断体验并获得教育意义,从而确保自己作为中华民族成员的同一性。

近年来,作为传承媒介的博物馆,被我国政府高度重视。2021年5月24日,国家文物局等9部门发布《关于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在2035年基本建成世界博物馆强国。^[43]每

一个新馆的成立,对于其中的展呈之物而言都意味着“本体论意义上的晋升、一次性质或本质的改变”^{[44][672]}。文物不但被赋予思想,而且被赋予“生命”——成为一代代共同体成员需要记忆的对象。当然,文化记忆的传承意味着需要经历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漫长时段,只有放在更宏观的时间尺度下,才能更清楚地洞察其对公众精神层面影响的历史意义,博物馆对文化记忆的中介化运作无不期待更多个案研究。

参考文献:

- [1] 唐士哲. 思想、主义、信仰的后勤支援:评介德布雷的媒介学与《普通媒介学教程》. 传播、文化与政治, 2019, 9(1): 123-134.
- [2] 德布雷. 媒介学引论. 刘文玲, 译.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4.
- [3] 胡翼青, 王焕超. 媒介理论范式的兴起:基于不同学派的比较分析.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0, 42(4): 24-30.
- [4] 骆世查. 作为中介行为的媒介:德布雷的媒介理论初探. 中国传播学评论, 2019(8): 87-106.
- [5] 黄华. 技术、组织与“传递”:麦克卢汉与德布雷的媒介思想和时空观念.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7, 24(12): 36-50+126-127.
- [6] 朱振明, 付佳洁. 德布雷媒介学研究中的“物质性转向”. 全球传媒学刊, 2022, 9(5): 73-86.
- [7] 阿斯曼 J. 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 金寿福, 黄晓晨,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 [8] 阿斯曼 A. 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 潘璐,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 [9] 哈布瓦赫. 论集体记忆. 毕然, 郭金华,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 [10] 沈关宝, 杨丽. 社会记忆及其建构——关于黄道婆的集体记忆研究. 东岳论丛, 2012, 33(12): 83-94.
- [11] 范玉刚, 许诗怡. 文化记忆的展演与重构——以故宫为个案的文化学视角考察. 南京社会科学, 2024(11): 123-131+140.
- [12] 张宏邦, 卢柯含. 塑造与凝聚:民族传统节日中的文化记忆与民族认同. 民族学刊, 2024, 15(12): 87-95+151.
- [13] 潘丽文. 短视频中的文化记忆建构:符号象征、叙事策略与主体互动.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 41(5): 141-150.
- [14] 燕海鸣. 集体记忆与文化记忆. 中国图书评论, 2009(3): 10-14.
- [15] 郭斐珺, 马凌. 以博物馆为媒介:新时代国际传播的一种方法. 当代传播, 2022(1): 39-43.
- [16] 杨善华, 孙飞宇. 作为意义探究的深度访谈. 社会学研究, 2005(5): 53-68+244.
- [17] 德布雷, 赵汀阳. 两面之词:关于革命问题的通信. 张万申,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4.
- [18] 孙诒让撰, 孙启治点校. 墨子间诂.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 [19] 巫鸿. 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 李清泉, 郑岩, 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 [20] 钱存训. 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4.
- [21] 王子今. 考古学与中国传统文化. 历史教学问题, 1999(4): 37-38+9.
- [22] 金庆浩, 戴卫红. 出土文献《论语》在古代东亚社会中的传播和接受. 史学集刊, 2017(3): 51-64.
- [23] 李零. 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 2版.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 [24] 王国维. 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姚淦铭, 王燕. 王国维文集:第四卷.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7.
- [25] CLAUDE J, BORBALAN R. La fabrication de dieu: entretien avec régis debray. Sciences humaines. (2002-03-01) [2025-06-20]. https://www.scienceshumaines.com/la-fabrication-de-dieu-entretien-avec-regis-debray_fr_12514.html.
- [26] 肖维波. 甘肃简牍博物馆开馆 千余枚珍贵简牍首次亮相. 国家文物局官方网站. (2023-09-12) [2025-04-21]. http://www.ncha.gov.cn/art/2023/9/12/art_722_183970.html.
- [27] 阿斯曼 A, 阿斯曼 J. 昨日重现——媒介与社会记忆. 陈玲玲, 译//冯亚琳, 埃尔. 文化记忆理论读本. 余传玲,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 [28] 陈卫星. 传播与媒介域:另一种历史阐释. 全球传媒学刊, 2015, 2(1): 1-21.
- [29] 本尼特. 博物馆的诞生//文化、治理与社会:托尼·本尼特自选集. 王杰, 强东红等译.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6.

- [30] 兰州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要闻|甘肃简牍博物馆建设项目获批啦! 将坐落在七里河区总投资 4.5 亿元. (2017-12-21) [2025-04-21].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87362046078407832&wfr=spider&for=pc>.
- [31] 奥斯曼. 集体记忆与文化身份. 陶东风, 译. 文化研究, 2011(11):3-10.
- [32] 迦纳. 政治科学与政府. 孙寒冰, 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6.
- [33] 史密斯. 民族认同. 王娟,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8.
- [34] BENNETT T. The birth of the museum: history, theory,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1995.
- [35] 胡潇. 甘肃简牍“热”现象背后的“冷”思考. 央广网. (2024-05-27) [2025-04-22]. https://gs.cnr.cn/gsxw/kx/20240537/t20240527_526720702.shtml.
- [36] 德布雷. 普通媒介学教程. 陈卫星, 王扬, 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
- [37] 宋喜群, 王冰雅. 甘肃: 简牍绝学“用起来”“热起来”. 光明日报, 2023-08-11(1). [2025-06-20]. 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23-08/11/nw.D110000gmrb_20230811_2-01.htm.
- [38] 麦克卢汉. 麦克卢汉序言//伊尼斯. 帝国与传播. 何道宽,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 [39] 黄旦. 伸向月亮的那根“手指”: 再说媒介学——读雷吉斯·德布雷的“媒介学”. 新闻记者, 2025(1):3-17+70.
- [40] 陈纪, 韩凯波. 新传播媒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功能. 民族学刊, 2023, 14(1):42-49+144.
- [41] 张丽华, 唐润华. 天涯若比邻: 短视频与可体验的共同体.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4, 46(7):109-116.
- [42] 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3. 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 方尔平,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
- [43] 中央宣传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 等.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关于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 (2021-05-24) [2025-12-23].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5/24/content_5610893.htm.
- [44] 布尔迪厄. 国家精英: 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 杨亚平,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Manufacturing Cultural Memory: The Mediation Practice of a Bamboo Slips Museum

Zhang Lihua, Chen Xingyu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In ancient China, bamboo and wooden slips served as communication media rather than objects intentionally preserved by contemporary people for future generations. As a result, there were discontinuities during the process of inheritance. The modern museum represents a material condition for the existence of ideas. It is precisely through the intermediary role of the “museum” that the concept of “China in the words of bamboo museum” has become a cultural memory that modern people need to acquire. It involves three levels in practice. First, museums expand the subject of memory from experts to the general public in society. Second, fragmented, amorphous, and unrelated bamboo slips are re-contextualized by museums, bringing cultural relics related to the fate of modern nations into the public eye and making them objects of cultural memory; bamboo slip museums intervene in public education systems and mass media, guiding the public’s “viewing” toward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Chinese culture represented by these slips, thereby facilitating the diffusion of cultural memory across broader social spaces.

Key words: bamboo slips; museum; inheritance; mediation; cultural memory

■ 收稿日期: 2025-08-25

■ 作者单位: 张丽华, 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甘肃国际传播研究中心; 甘肃兰州 730070
陈星月, 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 责任编辑: 刘金波